

斯诺辗转访问延安

刘晖

斯诺对陕北的访问,直接给他提供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题材,这本书被西方媒体誉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那么,斯诺最初为何想要访问陕北呢?这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

访问陕北的动机

少年时期,埃德加·斯诺就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这给他留下了关于这个东方国度的一些印象。1928年,斯诺经夏威夷、日本等地来到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后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上海的特约通讯员。

1931年9月,斯诺在上海多次拜会宋庆龄,被她的伟大人格所感染,两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经宋庆龄介绍,斯诺结识了鲁迅等人。在鲁迅的帮助下,斯诺编辑完成英文版的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成为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1933年秋,斯诺离开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在此期间,他与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分子保持密切往来,从学生那里得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在斯诺看来,“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红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

到底是怎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他们“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新闻记者特有的新闻敏感和问题意识,让斯诺产生了数十个疑问。“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斯诺由此萌生了到陕北红色访问的念头,想亲眼看一看蒋介石试图要“清剿”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这一愿望,宋庆龄表示赞同并愿意提供帮助。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电报,内容是请宋庆龄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开始酝酿访问陕北红区的相关事宜。

踏上“探险”之旅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西北地区的政治局势趋于缓和,这为斯诺进入陕北红区提供了操作的空间。斯诺“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在南京国民政府严酷的高压政策之下,去红区“确实是有危险的”,这一点斯诺非常清楚:“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在这种冒险精神的驱使下,6月的一个午夜,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性墨水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探险”之旅。

出发时,斯诺感到身上不太舒服,可心里却非常兴奋。之所以兴

奋,是因为“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是到“红色中国”去。之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斯诺听到西北地区流行天花、霍乱等疾病的传言,“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

火车沿京汉铁路一路南行到达郑州,然后换乘沿陇海铁路西行的列车。火车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爬行,抵达西安火车站。到西安府后,斯诺拜访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邵力子证实了斯诺之前所得到的消息:东北军已秘密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共识,“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安排适当,到前线去是可能的。不过,蒋介石控制着在西安的蓝衣社宪兵,还在继续搜捕共产党员,到处是特务,“空气极度紧张”。

斯诺要与陕北方面取得联系,除了介绍信,就“只有一个希望”:在约定的旅馆住下来,等候一位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可算是“一无所知”。几天后,一位身材高大,“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走进房间,用英语跟斯诺打招呼。这位王先生的真实姓名叫董健吾,他成功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通道。

7月初,在董健吾的安排下,斯诺乘坐东北军的军用卡车,由西安经宗蒲县到洛川、延安,然后步行到前线。跟随斯诺的是在延安雇来的一个骡夫,把“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途中,斯诺历经“白匪”追逐的险境,几经周折,终于在7月9日到达红军前哨司令部所在地安塞。

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向一位外国记者打开,这让斯诺感到惊奇和怀疑,但事实很快就使他相信了中国共产党人给他自由活动的诚意。

“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

在安塞,一位蓄着浓密黑胡子、面目清瘦的青年“军官”接待了斯诺。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令

斯诺倍感意外,他就是周恩来——“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斯诺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这里受到隆重接待,大半由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迎接斯诺的到来。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7月13日晚,毛泽东礼节性看望斯诺,用力同他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7月15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7月16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2时,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强调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此后,毛泽东多次同斯诺长谈,阐述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回答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第一次公开表达独立自主立场,畅谈联合战线、红军长征等问题。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到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他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士兵、农民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撰写并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以第一手资料报道了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世界发出红星闪耀的信号。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被西方媒体评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

这本书也是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绝佳范本。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政府国务卿徐世昌:“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幸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若不幸而遭殃,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后来,袁世凯暴毙,章太炎获释回家,不久又参加“护法运动”,此后逐渐闭门谢客,专注研究国学。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闸北,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奋起抵抗,章太炎、汤国梨夫妇组织义演义卖,收容治愈抗日将士140余人。之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无论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还是奔走营救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都少不了这对革命伉俪的身影。

章太炎病逝后,汤国梨拒绝给他盖国民党党旗,抗议南京当局的独裁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汪伪政府几次想拉汤国梨下水,都被严词拒绝。有感于强寇入境,汉奸粉墨登场,不少妇女为了保持节操而有投水者,她写了一首《感事》抒发悲愤心情:“纷纷龙血战炎黄,强虏骄淫锐莫当。死节原来臣妾事,独留青史赋红妆。”抗战胜利,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内战,汤国梨担任“中央委员”“国大代表”,处处彰显一代巾帼女杰的绝世风范。

1956年,73岁的汤国梨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来历任民革苏州市委会副主委、主委。汤国梨曾在入党申请书上深情写道:“拥护中国共产党,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和平解放台湾、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汤国梨晚年当选江苏省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代表,同时也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政协委员。91岁那年,她写下长诗:

台湾遥望路漫漫,故旧飘零亦老残。何事有家归未得,鱼书何以报平安。祖国光辉举世知,领邦节使竞相驰。辉煌奠定千秋业,半壁江山得几时。吾生九一今初度,阅尽沧桑几度时。余子纷纷零落尽,只留正气在人间。睦邻爱国为天责,委婉依人性自羞。功罪分明千古事,悬崖勒马早回头。

戈宝权服膺瞿秋白

周二中

WENREN YISHI

高尔基《海燕》末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成为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向旧世界发起冲锋的无畏呐喊,震撼人心、众口相传。译者戈宝权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江苏东台人。

前不久,东台中学高级教师陆新民先生(已退休)来到笔者办公室,聊起另外一件事:

1987年,戈宝权回到东台老家探亲,住在东台招待所。当时戈宝权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陆新民前往拜访。陆新民是中学语文教师,自然会聊到名篇《海燕》。

陆新民对戈宝权说,您译的

散文诗《海燕》一直是广大教师和学生最喜爱的课文,译得好。戈宝权跟陆新民解释说:“其实高尔基的《海燕》在俄文中并不是散文诗,而是俄文律诗,俄文也有像我们唐诗一样的文学体裁,讲究对仗押韵等,只不过我在翻译时将它译得句式自由了些,像我们的散文诗。”

对于陆新民提出的“译得好”,戈宝权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他说:“国内译高尔基的《海燕》,我认为译得最好的是瞿秋白。瞿秋白是政治家,他不仅将《海燕》的文字之美译出来了,还译出了诗中海燕勇于斗争敢于反抗的神韵,这一点,我达不到。”

叶圣陶提携后辈

周星

WENREN YISHI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天,叶圣陶突然收到了一位初二学生寄给他的信——《<多收了三五斗>读后感》。叶圣陶收到信后,很快就回复了对方。在信中,叶圣陶首先肯定了那位学生的作文情感真挚,希望对方好好读书,长大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特别告诫对方要热爱劳动人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这以后,叶圣陶和这位初中生成了感情深厚的“忘年交”,一直书信联系不断,先后通信达250余封。

在叶圣陶的影响下,这位初中生也成了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后来,当他向叶圣陶吐诉苦衷想寻一本朱自清的《背影》而不可得的时候,叶圣陶却很快复信告诉对方:“信悉,《背影》打算向朋友或单位借……”不到一周,

叶圣陶又复信告知:“《背影》尚未借到,不久可以借到。”几天后,叶圣陶再次回信说:“至善(叶圣陶长子)已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藏书目录上见读,也终于借到……顾虑邮寄或阅读中恐有散失,我就抄下来寄你。”

第二天,年近80岁高龄的叶圣陶在眼力精力不济的情况下,戴着老花眼镜,手执放大镜将朱自清1300多字的《背影》,用平整而又自然的楷书抄录在信纸上。为确保对方收到信,他还专门用挂号信邮寄。为了一篇《背影》散文,叶圣陶前后通信4次专门提及这件事,终于让这位老师如愿以偿。

这几封信不仅凝聚着叶圣陶对年轻一代关心培植的心血,同时更饱含着他与朱自清相识相知20多年亲如兄弟般的友情。

丰子恺和他的白鹅

崔鹤同

WENREN YISHI

抗战胜利的前3年间,丰子恺曾在重庆沙坪坝庙湾自建的小屋居住。

小屋非常简陋,一共60多平方米,隔成了3个房间。每间又分成前后两室,共得6室。中央一间的前室大些,但也不到16平方米,算是食堂兼客厅;后室是家人的卧室,只有5平方米多。西边一间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的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丰子恺的书房兼书房。

那3年,丰子恺坐卧和写作都在这10平方米内。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东墙上被晒得烫手。

丰子恺对外极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在抗战期间,在荒村里,这幸福

就伴随着一种苦闷——岑寂。为了避免岑寂,丰子恺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养鸡。其中,鹅留给丰子恺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色,那么雄壮的声音,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岑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

饶有意味的是,这鹅原是丰子恺的姓夏的邻居送给他的,后来丰子恺又把它送给了住在小龙坎的一个朋友。

白鹅,在烽火连天、黑云压城的艰难岁月,给了丰子恺以些许的慰藉与温暖,给枯寂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周立波找“模特儿”

王剑

WENREN YISHI

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问世后,引起了轰动,发行量很大,荣获了苏联斯大林文学奖。有人向他请教写作的经验,周立波说:“创作的源泉,主要是在十分熟悉的地方。作家必须花一点精力,费一点光阴,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顶好一辈子都在那里。”

1955年秋天,周立波选择了回乡落户的方式,从北京市迁到了湖南益阳郊区桃花仑乡的竹山湾。一身灰蓝布中山装,一双解放鞋,一口益阳土话,干各种农活。周立波把竹山湾当成新的创作基地,每天随身携带铅笔和笔记本,寻找着可用于“小说创作的模特儿”。

周立波朝夕相处的邻居叫邓益廷,是竹山湾的一位“庄稼把式”。邓益廷有三手绝活儿:第一是把田,高低不平的田,别人都能不平,他操起铁耙,几个人回就把搞定;第二是筛米,他操动筛子旋转几个回合,就能把米与谷分开;第三是识牛,还会治牛病。周立波

跟着邓益廷学会了好多农活,还收集到大量的生活素材和方言土语。邓益廷称周立波为“周部长”,周立波称邓益廷为“田状元”。

后来,周立波创作长篇《山乡巨变》时,“笔尖一接触稿纸,形象和场面立即从脑子里泛溢出来”。他以实际生活中的三个“面糊”为模特,即亭面糊(周立波的邻居)、仙面糊(周立波的父亲周仙梯)、桌面糊(亭面糊的弟弟邓佐廷),塑造了“亭面糊”盛佑亭的形象。其他人物形象也都有原型,办社干部邓秀梅的原型是团县委副书记彭玉霞;爱社如家的农业社社长刘雨生的原型是桃花仑乡合丰农业社社长曾五喜;具有“婆婆子”性格的乡长李月辉的原型是大海塘社的主任陈桂香;团支书陈大春的原型是陈年春;盛学文的原型是邓益廷的儿子邓焕章。

最终,周立波凭借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成为乡土文学大家,与同时期的赵树理共享“南周北赵”的美誉。

妇运先驱汤国梨

冯杰



章太炎与汤国梨的结婚照

这张照片是1913年6月汤国梨与章太炎的结婚照。

对于这桩婚姻,女方汤国梨事先并不看好,她曾坦言:“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相差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即剪辮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从上述见识来看,汤国梨并非等闲之辈:武昌起义时,许多省份响应革命,纷纷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偏偏负隅顽抗,江浙一带的仁人志士组织联军攻向南京。汤国梨与多位同学四处奔走,热心组建“女子北伐队”,募得经费5万余元,后因联军攻克南京而作罢。

民国肇始,汤国梨、吴芝瑛、陈擷芬曾联合各界妇女代表给孙中山写信,建议在参议院和国会开会时“为女界预留旁听席及参政席”,希望“中华女子有完全的参政权”;同时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聘请宋庆龄为名誉社长。孙中山很高兴,回信肯定“女界多才”,承诺“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还专门拨款5000元作为扩充公益之用。

受此鼓舞,各位女杰在上海创办神州女学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既担任教师,又兼任编辑,积极提倡妇女参与政治、谋求平等地位以及经济自立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汤国梨与章太炎婚事的介绍人是总统府秘书张通典,其子张昭汉与汤国梨是同学,帮助搭线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结婚当日好不热闹,男女宾客多达2000余人,章太炎即席赋诗曰:“吾生虽稀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

结婚当天,孙中山、黄兴、陈其

美等人莅临现场贺喜,蔡元培担任证婚人,可见婚礼仪式之隆重非凡。

新婚不及月余,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爆发,皖、粤、闽、湘、川等省及上海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伐袁世凯的行列。章太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执意北上面斥袁世凯,结果遭到长期软禁。汤国梨致信北洋